

和平發展觀察

2019 年第 3 期（总第 4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9 年 6 月 24 日

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趋势

廖峥嵘 刘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爆发，经贸领域冲突不断升级并向外蔓延，形成全面战略竞争态势，将带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大国关系、全球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前景进入高度不确定状态。我应排除干扰，坚持以我为主发展方

针，积极应对，将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控制在有限范围，努力实现各阶段发展目标。

一、中美发展模式开始相撞

（一）中美陷入结构性矛盾压力之中。从 2000 年左右开始，中国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成长为世界第二，2015 年开始，中国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为世界第一。中国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其结果，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固有的差异开始发挥现实影响，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主导的现有秩序形成挑战。一是守成国与新兴国的矛盾。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引起美国的担忧和恐惧。中美已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与历史情况不同的是，中方正尽量避免踏入陷阱。争取与美国实现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并将竞争纳入规则框架下。这一诉求尚未得到美国完全响应。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美国影响力相对衰落，但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力结构不均衡，人均 GDP 水平处于中下游，科技短板突出。

在全球治理的权力分配、责任分配及利益分配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矛盾大于与发展中国家矛盾。三是意识形态差异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矛盾。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美国积极在全球推行分权政治、“普世价值”，两者在观念上有差异，在行动上对立。班农等极右派认为，两者无法兼容。四是两种国际秩序的矛盾。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治理结构决定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立场差异。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分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经济上享有同等权利。强调主权高于人权，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为解决全球治理缺乏权威问题，中国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不追求将国内秩序向国际推广。美国则是在国内推行三权分立，在国际上追求独霸，推行“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主导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联合国等只是其掩护），但又不受秩序约束，保留“例外”行动特权。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上。可以国内法为理由，实施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甚至武力干涉别国内政。

几组矛盾的本质是中美现实和发展利益出现结构性分歧。

（二）中美矛盾呈全面爆发之势，目前爆心在经贸、科

技领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进入动荡加剧、演变加速期。当前各领域问题迭次爆发，主要问题集中在经贸、科技，经贸冲突面临升级，结构性压力继续强化。

一是美方态度近期内难发生实质变化，中美经贸冲突常态化、长期化，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将成为常态。第一，美方已将关税作为目标，而非仅仅是促成协定手段。彻底取消加征关税难度较大。第二，美方明确拒绝从既有立场后退，平衡协定文本的要求与此相距较大。第三，贸易摩擦对美方经济的打击效果尚未全面显现，美方经济、市场、投资预期以及特朗普支持率未受明显影响。第四，贸易磋商的同时，美方已经在各条战线展开全面攻势，中美达成经贸协定以稳定双边关系作用日益降低。第五，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即使近期内达成协定，美方举措也不会轻易收手。班农明确表示，美方将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视为临时停火协定，保留随时开火权力。协定只是为下一轮冲突争取一个缓冲期，期间看谁能够争取到更多优势，并将优势带到下轮谈判桌上。第六，贸易战还有蔓延之势。当前主要是关税战、贸易壁垒战、投资限制战、科技封杀战、供应链绞杀战，下一步可能发生汇率战、金融战和美元霸权保卫战。

二是极限施压随时从手段变为目的。在经贸领域爆发全面纷争同时，美方在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人文交流领域对我加紧施压。继美国政府文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班农等极右势力第四次复活“当前威胁委员会”，专门针对中国。为美国政府制定极端反华战略提供思想动员、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班农公开宣示，只要中共还在统治，美国就不能与中国共存。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斯金纳在演讲中声称，中美之争更甚于当年美苏之争，属于“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是第一个非白人的挑战美国的政权”。美以中止合作关系为要胁，企图压服盟友、伙伴配合美封杀华为、抵制“一带一路”等。美国将南海自由巡航定期化，常态化，并拉拢更多盟友参与。美频频在涉疆问题上制造杂音，破坏我与中东国家关系。近期美在涉台问题上步步进逼（提升对台军售规模、质量），试探我动武红线。不排除其硬闯红线（军事人员和装备高姿态入台，在台部署先进武器系统如萨德等），迫我提前摊牌，以期挑起两岸冲突，其可坐收渔利。

三是美方展开极限施压，远不止希望获得贸易磋商优势。宏观战略层面，美国内各政治势力已达成一致，期借此机会

形成对华全面遏制态势，全力阻止我发展成为足以从各方面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大国。严防在制度和文明竞争中被我超越。极端势力终极目标是企图像消灭苏联那样改变中国颜色；中观战役层面，美力图保持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科技创新力、产业竞争力优势，阻止我在这些方面对其形成挑战，防范我对其渗透；微观战术层面，美方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削减贸易逆差、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取消产业补贴、保护知识产权、实行对等关税、加强贸易执法等诉求，在磋商之外又采取了加征关税、启动长臂管辖，开列黑名单等手段打击我高技术企业等举措，在经贸领域四处开火，其核心企图有两点，第一阻止我科技进步，防止我技术竞争力对其形成威胁；第二改变双边和全球供应链走向，降低关键制造业产品对我依赖，逐步实现进口多元化。同时吸引跨国企业制造部门返回美国布局。希望借此阻止我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提升，阻止我经济崛起势头。为此，不惜针对在华企业（其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下手。在美方措施推动下，中美开始出现技术脱钩和经济脱钩趋势。

在微观层面，美方的诸多诉求与我改革开放要求冲突不大，经过努力磋商和调整，可以相互调适。在中观层面，双

方差异调合难度增大，但仍可基于基本竞争规则加以调适，仍有合作空间。在宏观层面，双方存在根本差异，难以调合。应力求相互包容，谋求共存之道。三个层面的矛盾相互渗透影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当务之急是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当前美方措施瞄准的是微观和中观目标。如果美方下步展开全面经济绞杀战，即发动汇率战、金融战、货币战以及全面的贸易壁垒和封锁，那就意味着美方展开了全面冷战，瞄准的是宏观目标，即将中国作为苏联那样的敌人，必欲打垮，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是否下了这一决心，动向仍待观察。

二、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一）贸易战将显著影响中美经济关系格局。一是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正逢两国经济增速下调，加大下行压力。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在 2019 年上半年同步下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下行较新兴市场国家更为显著。IMF4 月初预计美国 2019 年增速为 2.3%，下调 0.25，2020 年才 1.9%。而 2018 年则是接近 3%。中国增速也呈缓慢下降趋势，IMF 预计 2019 年是 6.3%，2020 年是 6.1%。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受内外环境影响，我增速可能保持在 6.1%至 6.3%

中高速。二是对两国贸易负面影响较大。通过滞后效应看出来，从2018年11月份起，中国的进出口增速双双下挫，到今年前5个月，对美进出口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恶化，为磋商增加困难。预计中美双边贸易增速将显著下降，出口分流势在必行。同时，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增加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关税其实是一把钝刀，但是美国别无选择。表明脱钩决心。三是我对美投资大幅下挫。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2019年1月的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外商直接投资(FDI，包括已完成的并购和绿地投资)先是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降至2017年的290亿美元，再进一步降至2018年的48亿美元。如果算上中国投资者剥离的130亿美元美国资产，2018年中国对美净投资实际上约为负80亿美元。美国政策调整与中国限制资本外逃的政策叠加，形成了这一结果。预计我对美投资将持续疲态。四是摩擦不断升级对两国金融市场均产生严重冲击。市场预期正在悄然生变。五是严重冲击双边和全球供应链。冲突会改变预期，影响投资决策，从而对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产生长期的潜在影响。预计未来，受美国限制贸易和

投资政策影响，中国出口会更加多元化，美国的进口也会更加多元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会慢慢发生变化。中美对对方市场的依赖度可能都会有所下降。产业链调整的冲击十分复杂，大大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六是中美市场力量将逆转。中国进口市场规模已与美国相当，且在逐步超越中。中国每年进口超过两万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现在是 1 千多亿美元，如磋商取得进展，未来可望逐步增加到 2、3 千亿美元。同时服务贸易逆差会扩大，双边贸易将更加平衡。整体上看，中国将由贸易顺差国变为逆差国。中美经济平衡将通过各自国内平衡来实现，关税杠杆作用越来越小。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主要不是开拓国际市场，而是扩大内需，提升国内供给水平。目前中国三分之一的进口是为出口，将来制成品（终端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份额会上升。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其中 2.5 万亿美元是服务。对他国吸引力将显著增大。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出现至少部分“脱钩”。一是高科技领域“脱钩”势成定局。美国视中国为科技竞争最大对手，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决心已下，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中国通过投资并购、关键产品进口、两国企业合资等方式，

获得美国所谓的关键和新兴技术，进而要保持美国的科技竞争优势，遏制中国科技崛起。中国通过经贸合作的方式，获得美国相关技术的道路基本被堵死，学习成本高涨。这反而激励中国在核心科技上自主创新和研发。中美长期科技竞争与较量不可避免。二是部分中低端加工制造业供应链“脱钩”。从美国对华发动的“关税战”可以看出，被加征关税的商品中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交通和装备产品、其他产品所占比重分别为 28.8%、50.6%、19.1%、0.8%和 0.7%。美国也有打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加工制造地位的意图。《经济学人》预计，鉴于中美经贸关系未来不确定性，部分信息通讯产品加工制造环节将从中国向越南、马来西亚迁移，大多数服装生产将从中国向孟加拉、越南和印度转移，许多汽车及零部件加工行业将从中国向泰国和马来西亚转移。加之中国主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动能转换，地方“腾笼换鸟”，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 3-5 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美在这些领域的垂直分工的合作关系或逐步淡化。三是国防安全相关的关键产业链“脱钩”。2018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国防工业上有 280 项零部件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依赖中国。中国掌握了全球和美国大部分稀土及其深加工品的供应，

美已制定措施，决心摆脱在稀土方面对华过度依赖。其他敏感的国防和安全领域产品及其零部件等，如无人机、机器人、特种钢等，美国也在制定切割计划。四是货币脱钩。人民币软钉住美元，外汇结算制度和资本管制等共同作用下，中国外汇储备集中在国家手中，不得不大量投资美国债市，其实是掉入了“美元陷阱”。有没有贸易摩擦，中美货币脱钩也势在必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双方在这一领域实现“脱钩”，为双方提供更多政策调整空间。但在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情况下，这种脱钩关系会非常复杂并脆弱。当前我金融领域风险堆积，需谨慎处理。

三、全球经济增长与经济治理变化趋势

未来五年是国际格局变化关键期，随着中美矛盾全面爆发，各种力量展开分化重组，秩序将重新调整。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内有动力不变，五年内会经历各种反复，但在十到十五年的周期内，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趋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经济治理格局将经历再造。

（一）全球经济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首先，经济增

长弱势将持续。世界银行在今年6月份的《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报告中，将2019年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2.9%大幅调降至2.6%。远低于2018年3%的实际增速，也是2016年来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9日晚间发布《全球经济展望》，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至3.3%，环比降低0.3个百分点，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与2018年相比，放缓态势更加明确，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在2019年上半年同步下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下行较新兴市场国家更为显著。其次，中期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低速增长。《经济学人》2019年3月预计，世界经济将在未来5年保持3.4%~3.6%增速。前提是贸易战不会大规模升级扩散，不至打断全球贸易活动。其中OECD成员增速在2018年见顶（2.2%），未来5年平均增速略降至1.9%。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区增速稍慢为1.8%。非OECD成员增速与过去5年相比略有提升，平均为4.5%左右。原因在于，自1970年代以来，各国生产率经历了大幅下降。生产率增长属于长周期现象，政策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是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第三，较长期看，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倾斜。10到15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以市场汇率计）

将超过美国。中国平均增速保持在 5%至 6%左右，美国平均增速将在 2%至 3%。发展中国家占全球 GDP 之比将达 60%。世界经济前十中，传统工业国与新兴经济体将分庭抗礼。第四，数字化和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科技革命可能在这一阶段出现集群式爆发，深刻改变生产生活和经济活动方式。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数字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主流，形态变化将带来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和治理模式变革。

（二）经济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首先，全球化主要来自三大动力，一是技术进步，包括了交通等贸易技术条件改善，以及当前的数字化信息化，促进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交流。二是美国创造了制度环境，美国主张自由贸易，为此建立一整套国际经济秩序。这套秩序指导各国降低贸易壁垒。三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现在前两大因素都出现问题。技术进步发生相反作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机器替代人工带来劳动力流动需求减少，发展中世界投资机会减少，投资的边际收益减少到一个极限。从制度上看，美国对全球化利益分配不满，要改变规则体系。如果过程处理不好，容易引起大国冲突，从而破坏现有秩序的体系。其次，当前全球

化出现“慢化”、“数字化”、“集团化”等特征。慢化即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指标，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降，从危机前超过全球经济增速一倍或以上，到与全球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据 DHL 统计，2017 年全球连通指数（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跨境流动）达到新纪录，但 2018 年将成为转折。WTO 经济学家 2019 年 4 月 2 日表示，2018 年全球贸易额增长 3%，大大低于去年 9 月做出的增长 3.9% 的预测。今年将延续这种放缓势头，预计增速为 2.6%。与此同时，全球经贸“数字化”。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将成为重全球化要推动力量。据 BEA 统计，2017 年数字经济占美国 GDP 的 6.9%。2019 年 2 月的瑞士达沃斯论坛，聚焦全球化 4.0，即数字和思想的流动以及数据本地化问题。此外，经济全球化在遭到“区域化”力量肢解后，还将进一步“政治集团化”。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恐将打乱全球产业链，导致贸易网络重组。美国要拉拢盟友重构全球贸易体系，排挤中国只能找政治理由，多边贸易体系可能让位于区域体系甚至政治集团体系，区域内、政治集团内贸易将超过跨区域贸易。全球市场可能受政治势力影响出现分割，贸易网络碎片化。如果中美矛盾持续扩大，全球化的方向取决于技术和市场追求统一的内在动力与美国政治

上分割全球市场体系的能力之间的较量。

（三）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变化。首先，贸易战的重心将转向规则塑造。基于规则的竞争已为大国共识，目前的任务是规则的不断完善和更新，期间将出现许多阵痛。竞争规则将进一步向边界内深入。各国经济主权将受到进一步限制，劳工、环境、气候保护将逐步成为硬性条款。其次，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将是未来大国构建新贸易关系的方向。跨国企业和企业家仍是国际贸易行为主体和推动全球化的主体，市场选择仍然是推进全球化的决定性力量，各国政府介入博弈只是调整分配关系，但未来面临一系列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政府加强政策协调和合作。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治理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一是防止技术垄断和数据垄断侵害公众权益，破坏社会生态。需要各国联合加强对跨国大公司的法律监管。二是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成为全局性、全球性问题，单一国家无法有效处理，需要各国协商制定新规则。三是国际投资规范急待建立。美国等正出台保护主义限制性措施，但开放、促进和吸引外资仍将是未来主要政策基调。未来的协商将更多纳入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内容；未来双边、区域和多边投资协定将构成投资保

障协定复杂体系。跨境投资合规性要求更高。可持续发展原则、企业社会责任新内容等将不断纳入投资规则；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可能被纳入投资协定，投资保护程度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在东道国政府规制跨境投资中的重要性上升。其三，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美元仍占据首位，但欧元和人民币体系更为成熟，人民币将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结算系统将取得一定活动空间，在应对美国金融制裁方面，中国将有更大回旋。其四，海洋、极地、外空等领域经济社会价值快速上升，争夺加剧，需要新的治理规范，美国难以一家独霸，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四、结论及建议

美国脱钩战略需要其他国家配合，需要改变大国关系格局。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没有卷入地缘政治冲突，只开展经济合作，与他国矛盾主要在经济层面。美国要分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需要提供相应的经济替代方案，难度非常大。中国需要做的事，就是加高替代

成本。

（一）维持与美斗而不破，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争取与美国建立更加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双边经贸关系。中美贸易不平衡状态本不可持续，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阶段性要求。贸易战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可逆用。打是为了和。可借机对双边经贸关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将货物贸易、技术、货币的相互依赖度适度回调，为双方国内调整创造更大回旋余地，以利关系长期发展。

（二）积极扩大自由贸易伙伴圈，不断升级贸易协定水平。除了向高标准看齐，积极升级已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还要考虑未来的路径。由于印度因素，RCEP 前景不容乐观。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目前没有加入任何大型区域性贸易协定，这些区域性贸易协定越来越像是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为寻求自保而采取应对措施。美国正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在其中种下不得与非市场经济体谈自贸协定的毒丸条款。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路径如果走双边，遇到的困难可能更大。可考虑加入区域性协定（CPTTP）以减少损失，并防止孤立于重要自由贸易区之外。

（三）拒绝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继续扩大开放。具体

落实好习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几点承诺：更广领域扩大对外资开放、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现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更加重视政策落实。同时，在开放中学会完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保护，并针对美国目标实施反措施，精确打击，反制其制裁。

（四）贸易战虽会对中美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可以承受各种冲击，保持各自发展势头。未来主要变化是供应链，即美国进口走向多元，中国出口走向多元。中国应在税收、金融、再就业等环节采取措施缓解部分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

（五）中国应继续产业结构调整，做强做大关键制造业。贸易战充分反映出制造业上游产品对下游产品的制约能力。中国应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支持鼓励企业向价值链攀升，占据主动。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市场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放手让市场引导技术投资方向，减少政策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除关键敏感技术外，产业链应向全球放开，坚持走贸易全球化、技术全球化道路，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竭力避免被美西方牵制形成两个分割的市场体系。

（六）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正联手制定国企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标准，逐步抬高门槛。国企改革要考虑对接国际通行标准。

（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银行标准下的高收入经济体，在 WTO 框架下失去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待遇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不如早作决断，这也有利于应对当前中美矛盾，有助于改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在参与 WTO 改革中取得更多主动。

（八）与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就海洋划界问题展开磋商，搁置主权争议，商议共同开发利用，互谅互让。中国的海洋利益已经全球化，应适当超越周边争端看问题。要与美磋商，完善海上军事接触的相应规则、细则，做好危机管控，防止意外擦枪走火。灵活处理自由航行原则不但可以缓和与美国矛盾，也有利我海军行动（我航母编队适宜的活动范围不是近海）向深蓝和全球拓展。

（责编：刘江）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9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9.6.24